

# 论邱熿与牛痘在华之传播

董少新

**【提要】**在鸦片战争以前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中国人中，他很少被提及；在中国医学史上，他也被视为边缘人物；即使方志也未为他立传，甚而对他进行诬蔑；后来的西方医生更对他所倡导的理论不屑一顾。然而他却利用所学到的西方牛痘术拯救了万千生灵，利用他的理论使这一技术在中国得到推广，并最终使所有中国人摆脱了天花之毒害。仅此而论，不管是在近代医学史上还是在明清西学东渐史上，其功绩无人能比。他就是广东南海人邱熿。本文着重分析邱熿对牛痘在华传播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邱熿 牛痘 《引痘略》 《引痘题咏》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1-0134-07

1960年3月在云南省发现中国最后一名天花患者；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消灭；1980年5月，第33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停止种痘。直到今天为止，天花仍是唯一被人类彻底征服的传染性疾病。人类对疾病的这一胜利应归功于人痘接种术与牛痘接种法。自从英国来华医生德贞（1837~1901）于1873年发表《牛痘考》一文至今，关于牛痘入华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研究各有侧重，但对邱熿的贡献均重视不够。本文对此略作论述。

## 一、邱熿传略

邱熿，字浩川，当时西方人也称他为 A - he - qua 或长头医生（Dr. Longhead），广东南海县人，生于1774年。他的幼时同学叶大林说：“浩川邱子，余同学生也。少有异资，余师学林陈夫子，曾一见而器重之，谓此子他年必有所就。既而邱子别业，偶游澳门，因得夷人种痘善法。井里赖其生活者，年以百计”。他的朋友钟启韶说“浩川家枕八桥，与予居接相望。衡素善鼓琴”。邱熿在科场失意后，前往澳门谋生，被东印度公司聘为买办。1805年5月啤道路滑商船抵达澳门之时，邱熿正在澳门。据他自述种痘经历云：“嘉庆十年四月，由小吕宋舟载婴儿，递传其种，以至澳门。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有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洎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邱熿在接种牛痘后不久，便学习了接种术，并为他的家人和朋友种痘。他应该是从皮尔逊那里学习种痘的。皮尔逊在他的报告里说：“为了使牛痘传播更加广

泛，我采取了最好的方式。我已经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的细节。他们在我的监督下为人种痘，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为人种痘<sup>⑪</sup>。邱熿应是这“几个中国人”之一。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应为梁国焯、张尧和谭国。他们由行商郑崇谦资助。所用的教材为1805年8月出版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如道光《南海县志》所云：“时洋行商人郑崇谦译刊《种痘奇书》一卷，募人习之。同时习者数人，梁辉、邱熿、张尧、谭国<sup>⑫</sup>。张尧、谭国生平不详。《番禺县志》有“梁辉传”，云：“梁国焯，字辉，上黄埔人，少孤，事母惟谨，饮食疾病必躬亲之。以监生屡试，棘闱不售，去而服贾，好善济人。痘症盛行，多死者，国焯悯之，求良法不可得。闻西人有种牛痘法，取牛所患痘浆，刺人臂，令痘出，数日即痂，无所苦。国焯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递传而至，费不貲。国焯无所吝，岁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谢。至今，人人知种痘，中国得免痘患，自国焯倡之也<sup>⑬</sup>。方志所据乃族人梁同新所撰《冕亭梁公家传》，自然有溢美之词，如说“中国得免痘患，自国焯倡之也”，有言过其实之嫌。彭泽益据梁方仲所藏此《家传》考梁国焯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sup>⑭</sup>。方志中找不到邱熿传，其《引痘略》在当时的方志中也并不常被提及，这一点确实有些奇怪。但是在皮尔逊的报告中只提到邱熿的名字，而没有提到其他三位的名字。

皮尔逊说邱熿自1806年开始投入种痘事业之中，成为最主要的种痘师，“他的方法、判断力和坚定不移的品格，使他在种痘事业上特别出色<sup>⑮</sup>。这与中文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据《番禺县志》记载，嘉庆十一年（1806）复有西人携小儿数十至粤传播牛痘，“比至粤，即以小夷痘浆施之华人，且传其法。众善士复捐资为痘医之费。由此学其术者日众。最精斯术者，莫如南海邱氏熿。邱著有《引痘略》行世。今粤中小儿因痘而毙者甚少<sup>⑯</sup>。此后，邱熿一直随皮尔逊穿行于粤澳两地为人种痘。至嘉庆十五年（1810），众行商捐资在广州建立了种痘局，聘邱熿、谭国为痘师，定期为人种痘。此在道光《南海县志》中有明确记载：“十五年，……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十金，于洋行会馆，属谭、邱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赏，活婴无算<sup>⑰</sup>。广州种痘局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使广东地区种痘制度化，而且成为全国种痘的中心，使牛痘从广州向其他省份扩散。但对于此种痘局的建立时间，以往学者误认为1815年。此错误源于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学史》，其云：“1815年，主要的行商建立了一个基金，以便一年四季为穷人免费种痘。在广州十三行街的行商会馆开有一个种痘局，在那里由中国痘师每九天一次为人种痘，每次接种的儿童在15-40人之间<sup>⑱</sup>。王、伍二人没有注明其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但应该来自皮尔逊写于1816年的种痘报告<sup>⑲</sup>。但皮尔逊在报告中并没有说明种痘局的建立时间，将建立时间定为1815年只是王、伍的推测。彭泽益引用王、伍的说法，将种痘局开办的时间定为1815年<sup>⑳</sup>，亦误。

1817年，邱熿《引痘略》撰成出版。他在序中云：“熿素不知医<sup>㉑</sup>，但自从学了种痘法以后，他开始钻研中国传统医学，如《医宗金鉴》<sup>㉒</sup>和张琰的《种痘新书》等。他在《引痘略》中，尝试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种牛痘，这对中国人接受牛痘法非常重要。《引痘略》在首版后的100年（1817~1916）中，再版过50余次<sup>㉓</sup>，在晚清医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光《南海县志》云：“《种痘奇书》一卷，国朝郑崇谦撰。按牛痘之方，嘉庆十年自外洋至，崇谦为洋行商，刊此书，募人习之。同时习者数人，今则人精其业矣。崇谦歿后，后嗣势微，遂有窃其书而增益之以问世者，不复举崇谦之名氏也。良可慨矣！<sup>㉔</sup>同治《南海县志》云：“《引痘略》，国朝邱熿辑。案郑崇谦《种痘奇书》一卷在此书前，前者（按指道光《南海县志》）

已著录<sup>[25]</sup>。彭泽益引用了这两则资料以证明行商在传播牛痘方面的作用<sup>[26]</sup>。行商确实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传播牛痘提供资助。但是《种痘奇书》并非郑崇谦之作，属名郑崇谦主要是为了借其名望以使该书更具影响力<sup>[27]</sup>。而且，尽管邱熹在《引痘略》中引用了《种痘奇书》的基本内容，但《引痘略》的确是一部新的专著，增加了许多内容与理论。事实上，《引痘略》比《种痘奇书》更加有利于牛痘在中国的传播，也确实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有的书说邱熹“在三十年中种痘超过 100 万，并将其术传于其子；中国其他的种痘机构也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了”<sup>[28]</sup>。说他在 30 年中种痘超过 100 万，似不可能。但是邱熹确实将种痘术传于其长子邱昶，邱昶从 1818 年开始便在广州种痘局为人种痘。邱熹于 1851 年去世<sup>[29]</sup>，从事种痘事业近半个世纪。

## 二、《引痘略》

李约瑟说：“中国人确实热情地接受了牛痘”<sup>[30]</sup>。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在牛痘刚传入之时。很多人对牛痘表示怀疑与担心，害怕接种后会为其所害；中国传统人痘师更加诋毁这一新的接种法，担心其得到广泛传播后失去自己利益。徐士显诗云：“外洋牛痘梯航来，少见多怪人疑猜”<sup>[31]</sup>。

这种猜疑导致牛痘在传入之初至少有两次失传。皮尔逊 1816 年的报告说：“事实上，自从牛痘首次传入中国，已经有两次失传了。但两次均由吕宋岛再次带来”<sup>[32]</sup>。中文文献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两次牛痘失传。《番禺县志》云：“嘉庆丙寅（1806）种痘者稀少，痘浆不继，复命夷医回国，携痘浆至粤。夷乃携小夷数十，沿途种之”<sup>[33]</sup>。道光《南海县志》云：“粤人未大信，其种遂失传。（嘉庆）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按即 J. W. Roberts）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sup>[34]</sup>。诸行商捐资建立种痘局即是在牛痘第三次传入之后。

中国人痘师对牛痘尤持抵制态度。据皮尔逊说：“中国医学界，尤其是致力于治疗天花的医生们几乎完全不接受牛痘。失败的警告不时传播开来，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大障碍。他们将痘症、麻疹、天疱疮、皮疹等病症都说成是先前种牛痘造成的”<sup>[35]</sup>。他在 1821 年的报告说：“牛痘已被传入邻省江西，但在那里又失传了，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僧侣们强烈抵制此法。保持天花的流行使他们可以双重获利：一方面他们常被雇佣作为痘师为人接种人痘；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天花带来的痛苦，人们通常会服侍他们的神祇。一次猩红热的爆发为他们反对种牛痘提供了借口，他们指责种牛痘是将病毒植入体内，以便将来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sup>[36]</sup>。龚在德赠邱熹诗证实了皮尔逊的说法，其注云：“洋痘多则天行少，痘师不得居奇，故多谤此事”<sup>[37]</sup>。更多的中国人，尽管逐渐接受了牛痘，但仍持有偏见。例如他们不愿意在夏、秋炎热季节带他们的孩子前来接种，认为所有疾病在这样的季节中都会比平常更加严重和危险。此乃受传统人痘理论之影响。为了保持痘苗不断，牛痘师常找穷人的子女，付给他们一定数额的钱，以便为其种痘<sup>[38]</sup>。

然而人痘师的偏见与抵制不仅仅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牛痘来自西洋。嘉庆十年，也就是牛痘入华之年，清廷明确规定：“严禁西洋人研习医术”<sup>[39]</sup>。所以，皮尔逊与斯当东在华著译有关牛痘的书籍在当时是非法的！中国人也不愿意相信海外存在比中国更加高明的技术与文化。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又因鸦片贸易而变得更糟。这些都是中国人接受这一外来技术的心理障碍。阮元（1764～1849）在邱熹为其子女种痘后，赠诗云：“阿芙蓉毒流中国，力禁犹愁禁未全；若把此丹传各省，稍将儿寿补人年”<sup>[40]</sup>。此诗表现了这位总督的复杂心情：应该如何对待西洋人？他们带来了毒害人民的鸦片，同时也带来了拯救婴幼儿的牛痘。

第二，西方牛痘法与中国传统人痘术所体现的是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文化背景。牛痘法将牛痘作疫苗接种于人的手臂上，而人痘术是将人痘作疫苗接种于人的鼻内。中国的人痘术在清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降低人痘的毒性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系统。在牛痘传入中国的时代，人痘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安全的程度，成功率可达95%以上，若是有经验的痘师施种，成功率甚至可达99%以上<sup>41</sup>。但是总体上而言，人痘接种远没有达到普及，这也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人痘苗十分昂贵，一般人接种不起，且人痘师往往将技术密而不传，以求更多利益<sup>42</sup>。这与牛痘免费施种，并大力公开推广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人认为人与牛不同气，所以无法接受将牛痘接种到人体内这一事实。而且，根据传统中医理论，疫苗应该接种于鼻内，因为：

痘之为毒，受于先天，感于时气，散于经络。男女交感之会，先天胎毒既有深浅，感时行之气复有善恶。而散于经络，分配五脏，又有轻重。正痘有发热即现点者，最险之症，肾经之毒也。由肾而肝，而心，而肺，而脾，传经既多，其症亦递减，故痘之发毒，肾最重，脾最轻。按古痘苗塞鼻孔法，亦必五脏传遍，始能发热。缘鼻者，肺之外窍也。苗塞鼻中，其气先传于肺，肺主皮毛；肺传于心，心主血脉；心传于脾，脾主肌肉；脾传于肝，肝主筋；肝传于肾，肾主骨。痘毒藏骨髓之内，感苗气而发，其毒自骨髓尽达于筋，肾脏之毒解矣；自筋尽达于肌肉，肝脏之毒解矣；自肌肉尽达于血脉，脾脏之毒解矣；自血脉尽达于皮毛，心脏之毒解矣；自皮毛尽达于颗粒，肺脏之毒解矣。苗气必历五脏层递而入，内毒亦必历五脏层递而出。此传递之次序也。<sup>43</sup>

但是根据西医，疫苗可以接种于任何部位的表皮上，接种于手臂只是由于比较方便。当时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皮尔逊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解释牛痘的理论。正如曾钊在其《引痘略跋》中云：“然而人犹不能不疑者，未思其理也。”不过，如同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一样<sup>44</sup>，中国人对牛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首先，牛痘的效果甚佳。根据阿里亚戈1806年1月10日的报告，牛痘的效果非常之好，在刚过去的这个季度中，澳门无一人感染天花，相反在牛痘传入之前，每到这个季节都会有很多儿童和成年人死于天花<sup>45</sup>。邱熿也强调说自从他开始种痘以来，从来没有失败过<sup>46</sup>。行商的大力资助与推广、免费施种的方式都是使中国人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常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邱熿《引痘略》所建立的理论的作用。

邱熿认为，牛痘之所以更加有效，是因为牛属土，人五脏中之脾脏也属土，所以牛与人的脾脏同属一气，并非如一般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人牛不同气。天花病毒广泛存在于五脏之中，但其在脾脏中毒性小，而在肾脏中毒性最强。故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天花病毒引出来，从而使全身免受其害<sup>47</sup>。他还认为：

今种牛痘法，择于两臂中消烁、清冷渊二穴，上下交连之处种之。似于塞鼻法有异，殊不知人身两臂，乃手少阳三焦经也。三焦者，人身最关要之府，如天地之三元，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通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得其关要之处引之，直从皮毛、血脉、肌肉、筋络同时直传而入，使有胎毒深藏于肾，亦自然同时引掣而出，如引路然。……《金鉴》所谓引其毒于未发之先者，即此意。张逊玉《种痘新书》所谓以佳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横而症自顺者，亦此意。故凡种痘皆用引法，而引毒从皮毛、血脉、肌肉、筋骨同时而出，则牛痘为最捷也。<sup>48</sup>

简单概况邱熿的理论，就是由“种痘”转向中国传统理论的“引痘”，他将书名定为《引痘

略》，而不像《英吉利国种痘奇书》那样用“种痘”二字，亦有深意。

邱熿吸收了皮尔逊《种痘奇书》中最基本的内容，但是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进行了阐释。例如，他认为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可以种痘<sup>49</sup>，此与皮尔逊的观点一致<sup>50</sup>，但同时邱熿又认为男孩应该先接种左手臂，女孩应该先接种右手臂<sup>51</sup>。我们在皮尔逊的书中找不到这样的观点，显然邱熿附会了中国的传统观念于其中。邱熿还添加了很多合理的内容，例如他提醒牛痘师要辨别患麻风病的孩童，以免使健康的儿童因接种而感染麻风。另外，他还开出很多药方，以应付“痘损脓水不止”、“痘溃瘍”、“痘溃烂流血不止”、“痘破成坑不能合口”等情况<sup>52</sup>。

他在《引痘略序》中说：“牛痘之理，原包于种痘诸法之中。虽种之法有不同，而其为善方引导于外则一也”。此可视为康熙时代产生的“西学中源”思想的继续。邱熿《引痘略》使人相信种牛痘的理论起源于中国，尽管它来自西洋，但是其本质理论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的。这样，中国人便可以理直气壮地传播和使用牛痘了。阮元在其所修《广东通志》中亦持同样的观点：“广中近世有邱氏熿引痘方，其效甚捷。其法来自外洋。……少司马温公汝适闻之曰：‘《本草纲目》有稀痘方，用白牛虱，以此虱扑缘牛身，食饱自坠，用之能稀痘。盖取其中有牛血也。牛虱尚能稀痘，则牛痘必稀。用其苗以种，百无一失。理有固然。’是中国人已发其端，而外洋遂触类引申尔<sup>53</sup>”。刘彬华赠邱熿诗云：“岛夷妙术漫相猜，从相牛经悟得来。我欲为君书万本，遍传海内活婴孩<sup>54</sup>”。《相牛经》为春秋时人宁戚所著，为中国第一部畜牧业专著，则此诗作者亦是通过“西学中源”思想来寻求心理安慰。

尽管邱熿的牛痘理论并不科学，却为牛痘在华传播扫清了理论障碍与心理障碍。1850年以前，牛痘已经传入中国的其他省份，包括江西，湖南，江南，湖北，北京，浙江等<sup>55</sup>，传播的速度并不比在欧洲慢。

邱熿的理论遭到了英国医生德贞的激烈批评，认为其是故弄玄虚，投机钻营<sup>56</sup>。但是，该理论对当时中国人却影响至深，我们可以从邱熿编纂的《引痘题咏》诸诗文中体会到这一点。

### 三、《引痘题咏》

皮尔逊说邱熿“在种痘方面的卓越成绩受到了其乡亲们的大力赞扬，也受到了地方大员的鼓励<sup>57</sup>”。我们至今仍可在《引痘题咏》中读到这些赞誉之词。在行商的资助下，邱熿免费为人种痘。很多文人与地方官员的子女在接种了牛痘后，常以诗文赠邱熿。道光三年（1823），邱熿将这些诗文汇集成册刊行，取名《引痘题咏》，目的是“俾阅是卷者知取信之众，此法不巫，因之传于久远，是则余之心也<sup>58</sup>”。《引痘题咏》独藏于北京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尚未见有学者对此此诗文集进行研究。该书分为三卷，但第二卷为邱熿较早作品《引痘略》，故《引痘题咏》事实上只有两卷。

《引痘题咏》出版之前，邱熿有《天花新咏》稿本。叶大林说：“癸酉（1813），曾方伯嘉其医之良，以‘勿药有喜’四字颜旌之，一时戚友文人，因此分赋佳章，迭成《天花新咏》一帙<sup>59</sup>”。当诗文积累到了一定数量，邱熿便将其付梓，改名为《引痘题咏》。曾方伯所题之匾额被置于《引痘题咏》所有诗文之首，但是注明时间为嘉庆九年（1814），而不是1813年。所以，自1814年邱熿便着手为此书做准备了。为广牛痘之传，邱熿是颇费心机的。曾方伯即曾燠（1760~1831），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1781年进士，选庶吉士。时任广东布政使。因其一子由邱熿接种牛痘，故以此匾额相赠<sup>60</sup>。由于曾氏的名望与地位，其他士大夫也争相以诗文相赠，其

“勿药有喜”四字常被其他诗文所引用。

《引痘题咏》共收有 113 名作者的 130 余篇题咏文字。一项技术，特别是一项外来技术，受到如此多的赞颂，这在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诗文作者包括官员、文人、商人、军人、医生，甚至还有一名女诗人——江南琴川女士蒋宛仪。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或者在广东任职，而一半以上的作者来自南海和番禺二县。也有一些作者来自其他省份，例如，汉军镶黄旗驻防直隶中镇府舒和，湖南岳州知府刘光照，南雄佐牧汪阜，江苏茂才郑兆珩，福建宁化拔贡生伊念曾，等等。他们或是在游历岭南时得知种痘法的。

邱熿说这些诗文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但事实上那些高级官员所作的诗文被放在了前面。显然，邱熿如此做的目的是使此书更加具有影响力。诗文作者中级别最高者为两广总督阮元，其他高级官员如广东巡抚康绍镛，在道光元年（1821）赠邱熿一块匾额，上题“功参保赤”四字<sup>⑥</sup>；翰林学士、广东学政彭邦畴赠邱熿诗有云：“流传入中华，乍闻惊奇辟；及读邱君记，奏效皆目击”<sup>⑦</sup>。浔州通判周祥熙在其诗中注云：“余官顺德、澳门，屡延师种此痘”<sup>⑧</sup>。江西南城进士、清远知县蔡梦麟的诗有云：“不是先生仁术广，那知海外有方书”<sup>⑨</sup>。其他如督察院左副督御使李宗瀚、广东学政傅棠、国子监学政宋葆焜等官员均有诗文赠邱熿，不俱引。

行商除从经济上给予资助外，也为诗作文表彰邱熿、宣传牛痘。例如伍秉鉴长兄伍秉镛赠邱熿七古首段云：“人事补天天无功，天心牖人人乐从。牛痘始种自夷域，传来粤海今成风。等此批却导大窍，化尽险厄调鸿蒙。爷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sup>⑩</sup>。潘启官二世的长子潘正亨（1779~1837）<sup>⑪</sup>有一首五古赠邱熿，其弟潘正琛也有文章表彰邱熿，称“君是众人之母”<sup>⑫</sup>。

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同一家族的作者，如吴家树、吴家懋；叶应泰、叶应阶、叶应阳；叶梦龙、叶梦麟、叶梦鯤、叶梦草，等等。在一个家族中如果有一个成员接种牛痘成功，其他成员也就比较容易信任和接受牛痘了。这是牛痘得以推广的一种重要途径。

《引痘题咏》中的诗文，表现了当时中国人对牛痘所持的观点。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牛痘的理解几乎均是“邱熿式”的。人们接受了人牛同气的观点，如潘正亨的诗写道：“妙法传西域，始闻颈为缩。邱生既身试，种福延比屋”；“人禽虽异类，气不分麦菽。牛性秉坤顺，力任耕五谷。”<sup>⑬</sup>蔡梦麟诗云：“牛之性亦人之性，此语吾闻诸子舆”<sup>⑭</sup>。彭邦畴诗云：“本以人治人，何忧格不入？”<sup>⑮</sup>谢兰生诗云：“人牛虽异类，生理本一脉”<sup>⑯</sup>。伍秉镛完全接受了邱熿的观念，其赠邱熿诗有云：“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以气感气血感血，岂必炫耀矜神工”<sup>⑰</sup>。不仅认为人牛同气，也认为要按穴位施种。这些诗文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作者对邱熿的感激之情，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牛痘进行了最有力的宣传，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这种外来医术产生信任。明末清初，西洋医学主要由耶稣会士逐渐传入中国，但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然而，西洋和中国商人与医生一同传入的牛痘法，在 19 世纪的中国却影响深远。在这方面，邱熿的贡献尤为突出，而《引痘题咏》可视为当时的受益人赠给他的一座纪念碑。

德贞：《牛痘考》，载《中西见闻录》第二册第 13 号，1873 年 8 月（同治十二年七月），第 221~232 页；第二册第 14 号，1873 年 9 月（同治十二年八月），第 293~306 页。

有关牛痘入华的研究，主要有：陈垣：《牛痘入中国考略》，载《医学卫生报》第六、七期，1908 年 12 月，1909 年闰二月；K. Chimin Wong（王吉民）& Wu Lien - the（伍连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vol. 1,

Tientsin, 1932, pp. 139 - 164;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六),载《医史杂志》1953年第1期;彭泽益:《广州洋货十三行商倡导对外洋牛痘法及荷兰豆的引进与传播》,载《九州学刊》1991年4月第4卷第1期;田崎哲郎:《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 について》,日本の洋学论集,清文堂出版,1994年11月,第203~220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3~827页;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 - Social,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Panorama Médico - Social*,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 pp. 93 - 10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VI: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9 ~ 153.

在一些文献中,“痘”也被写成“薰”,但在邱熹所著《引痘略》中作“痘”,其印章亦作“痘”。《引痘略》,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北京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本。

为“阿痘官”之音译。

因其长头而得此名,参见 Wong K. Chimin & Wu Lien - the, *ibid*, p. 144.

邱熹在《引痘略》中云:“予少时未出天花,洋医为予种时年三十二岁,今已十有三年矣。”《引痘略》出版于1817年,故可推断邱熹于1805年接种牛痘,出生于1774年。

①③⑦⑧⑨⑩《引痘题咏》,卷一,第12、7~8、13~14、10、12、8、11页。

参见 Wong K. Chimin & Wu Lien - the, *ibid*, p. 146.

⑪邱熹:《引痘略》自序。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May, 1833, p. 37, 40~41, 38, 37, 38, 40, 41.

⑳邓士宪纂:道光《南海县志》卷44,《杂录》二。

㉑李福泰主修,史澄、何若瑶总纂:《番禺县志》卷四十七《列传》,同治十年(1871),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第582页。

㉒⑳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彭泽益,前引文,第80、83、81页。

㉞《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二,第677页。

㉟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邓士宪纂道光《南海县志》卷44《杂录》二。

㊱Wang and Wu, *ibid*, p. 145.

㊲御纂《医宗金鉴》出版于1742年,其中包括有《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乃当时种人痘的标准教科书。

㊳田崎哲郎,前引文,第203页。参见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

㊴道光《南海县志》卷25《艺文略》一。

㊵梁绍猷等续修同治《南海县志》卷10《艺文略》。

㊶H. B. Morse, *ibid*, vol. III, pp. 16 - 17.

㊷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 345.

㊸邱昶:《牛痘新法全书》同治元年序,光绪乙未宏道堂木刻本。

㊹Joseph Needham, *ibid*, p. 153.

㊺《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二,第677页。

㊻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May, 1833, p. 38. 郑梦玉等修、梁少猷等纂:同治《南海县志》卷26《杂录》五下,中国方志丛书本,第444页。

㊼卫青心著、黄庆华等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㊽彭泽益,前引文,第81页。

㊾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㊿张琰:《种痘新书》,乾隆六年(1741),续修四库本,自序。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邱熹:《引痘略》,第1~2、6、14~17页。

⑪种牛痘起初在欧洲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无法接受家畜的痘苗接种到人体内。这与中国发生的情况很相似。参见 Joseph Needham, *ibid*, p. 150, 注释139。

⑫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 p. 167.

⑬⑭⑮⑯⑰⑱邱熹:《引痘略》序,第4、1、2~3、5页。

⑲《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页五。

⑳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同治二年重刊本)卷三三一《杂录》一。

㉑⑳㉒⑳㉓⑳㉔⑳㉕⑳㉖⑳㉗⑳㉘⑳㉙⑳㉚⑳㉛⑳㉜⑳㉝⑳㉞⑳㉟⑳㊱⑳㊲⑳㊳⑳㊴⑳㊵⑳㊶⑳㊷⑳㊸⑳㊹⑳㊺⑳㊻⑳㊼⑳㊽⑳㊾⑳㊿《引痘题咏》卷一,第2页。

㉞参见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第36页。

㉟德贞:前引文,第232,293,303~304页。

㊱《引痘题咏》邱熹序。

㊲张衍基在赠邱熹诗中注云:“初为曾方伯子种痘,方伯以勿药有喜额赠之。”《引痘题咏》卷一,第6页。

㊳⑳㉔⑳㉕⑳㉖⑳㉗⑳㉘⑳㉙⑳㉚⑳㉛⑳㉜⑳㉝⑳㉞⑳㉟⑳㊱⑳㊲⑳㊳⑳㊴⑳㊵⑳㊶⑳㊷⑳㊸⑳㊹⑳㊺⑳㊻⑳㊼⑳㊽⑳㊾⑳㊿《引痘题咏》卷一,第1页。

㊿⑳㉔⑳㉕⑳㉖⑳㉗⑳㉘⑳㉙⑳㉚⑳㉛⑳㉜⑳㉝⑳㉞⑳㉟⑳㊱⑳㊲⑳㊳⑳㊴⑳㊵⑳㊶⑳㊷⑳㊸⑳㊹⑳㊺⑳㊻⑳㊼⑳㊽⑳㊾⑳㊿《引痘题咏》卷一,第10页。

㊱潘正亨小传见《番禺县志》,第564页。

作者简介:董少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江中孝]